

# 自然的过度资本化及其生态后果

## ——云南“橡胶村”案例研究

耿言虎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自然的过度资本化是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自然的客体化逻辑与资本的增殖化逻辑是自然过度资本化的两个内在逻辑。通过对云南一个“橡胶村”的田野调查,阐释自然资本化与生态失衡的关联与内在机理。双村由轮歇地农业、水田稻作农业等传统农业转型到橡胶种植,政策、市场、技术、文化是产业转型的条件。橡胶种植引起了生物多样性消失、农业面源污染、水土流失、水资源减少等生态后果。必须反思自然的过度资本化,倡导生态理性。

**关键词:**过度资本化;生态失衡;橡胶村;社会脆弱性;生态理性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4)02-0031-06

### 一、自然资本化与生态之关系

自从步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摩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的决定性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全球生态的根本性重组”<sup>[1]</sup>。资本主义化的生产方式如何影响生态,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是以“社会-环境”互动为视角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所要回答的。笔者认为,回答以上问题的核心是理解“自然资本化”这一概念。人类学家埃斯科瓦尔在《重构自然:一种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的要素》中提出“自然资本化”这一概念<sup>[2]</sup>。何谓“自然资本化”,顾名思义,就是将自然(土地、森林、水、草原等)赋予一定的市场价值使其可以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以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

自然资本化思想来源于卡尔·马克思、卡尔·波兰尼、詹姆斯·奥康纳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波兰尼批评现代社会不受规制的自由市场将原本不是商品的土地、劳动力等变成“虚构商品”投入市场进行交易,最终环境和人类自身都被“脱嵌”的市场所左右<sup>[3]</sup>。詹姆斯·奥康纳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

矛盾,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历史都是不断资本化生产条件的历史,而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物质性生产条件<sup>[4]</sup>。总之,自然资本化是一种将自然“祛魅化”为资源进行理性规划和管理的一套系统观念。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之前,计划经济一直是调节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主要手段。在经济学家看来,计划经济下的自然资源利用存在资源开发不足和资源过度开发的双重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发挥宏观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强。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自然资源资本化”<sup>[5]</sup>,意在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通过经济杠杆和价格机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化和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土地、草原、森林等自然被看作资源并赋予价值,纳入一套市场评估、转让、交易程序中。但是在自然资本化的实践中,常常造成自然的过度资本化。我国草原荒漠化、森林单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水污染与水资源枯竭等环境“剧变”<sup>[6]</sup>都与自然资本化密切相关。

实际上,学术界对自然资本化的逻辑早有反思,自然资本化与可持续性有难以调和的悖论。自然资本化中有两个内在逻辑造成了过度资本化的现实。其一,自然的客体化逻辑。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

收稿日期:2013-10-20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201206710004);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2\_0220)

作者简介:耿言虎(1986-),男,安徽长丰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 二、双村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历史

双村的传统农业是轮歇地农业,1949年以来经历政府农业改造,轮歇地农业和水田稻作业并重。1982年以来橡胶种植业逐步扩大。双村不同时期农业表现出不同的农业类型。

### 1. 轮歇地农业(—2000年左右)

轮歇地农业可以分为两个时期:①集体轮歇地时期(—1980年初)。双村历史上共有7块轮歇地,分布在村庄四周。每块轮歇地约300hm<sup>2</sup>,总面积近2000hm<sup>2</sup>。轮歇地按照顺时针次序轮流耕作,一块地种1年,7年更替一次。种植作物包括旱谷、小红米等。1949年以前双村有50余户,约300人。山地属于公地私用,耕地不固定,“号地”之后农户就有了该地当年的耕种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双村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人地矛盾逐渐尖锐,加之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影响<sup>②</sup>,特别是政府提出的“固定耕地”政策致使传统轮歇地耕种制度逐渐式微,单块地连续耕种年限延长至四五年。大量毁林开荒,生态环境明显恶化。②家户轮歇地时期(1980—2000年左右)。1983年包产到户后,集体轮歇地轮流耕种不复存在。村民在承包地里实行家户式小规模轮歇地实践。一般一块土地连续种植2年以上休耕2~3年,耕种前将杂草和树林燃烧作肥料,不用人工施肥。主要种植旱谷、玉米等农作物。

### 2. 水田稻作农业(1960—2000年左右)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为了实现民族地区粮食自给,对民族传统农业进行大力改造。M县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开展了农田水利建设,先后通过河道治理、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等措施改进水利状况。同时,开展坡地改梯地、坡地改水田,挖大沟取水,一些轮歇地相继改为雷响田和保水田。从“农业学大寨”起,政府提出要实现山区人均1亩水田的目标,集中人力挖沟造田,一直持续到1990年初。包产到户前由生产队集体挖田,包产到户后变为个人挖田。持续的“造田”运动成效明显,至1990年初,双村约有水田66.7hm<sup>2</sup>。1960年起,政府组织傣族和汉族农民传授佤族水稻种植技术,水稻种植在双村得到大范围推广。为改进土壤肥力,政府号

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互利共生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客体化的自然。埃斯科瓦尔指出传统时期的“自然”是一个“有机体自然”,自然世界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自然、超自然3个领域具有连续性。这一时期的自然往往被赋予一定的宗教色彩和神话要素,人对自然也充满敬畏之心。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自然”关系演变为“主体-客体”、“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去神圣化、客体化的“资本主义自然”得以形成<sup>[7]</sup>。自然的客体化逻辑改变了人对自然的认知,自然从具有丰富社会和文化意涵的情境中脱离<sup>①</sup>,成为可以开发、改造的客体化的对象。其二,资本的增殖化逻辑。无论是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作为一种资本的自然必然要实现资本增殖的本性,其表现就是追求效率和产出的最大化。但是,这种以最大产出为目标的生产行为恰恰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物质循环的基本原理,从而造成环境衰退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马克思敏感地认识到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对土壤循环的破坏。他指出,城乡断裂形成的人口迁移造成大量排泄物无法回田,而以提高产量为目标的化学肥料对土壤肥力的剥削严重影响了生态持续性,“代谢断裂”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必然结果<sup>[8]</sup>。运用生态学的生态足迹方法测量现今的地球生态,可以发现生态足迹逐渐超出全球生物承载力,持续增大的“生态赤字”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目前学术界对自然资本化的研究多以理论探讨为主,经验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云南M县双村为个案,揭示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生态后果及运作逻辑。双村共129户,400余人,位于滇西南,主体民族是佤族。海拔890m,年平均气温20.3℃,年降水量1500mm。双村1982年开始发展橡胶种植业。2000年左右,村中土地全部种植橡胶,成为富裕的橡胶村。橡胶产业发展的同时,潜在的生态后果日趋凸显。本文经验材料来自笔者2010年4月、2012年8月、2013年12月3次对双村的田野调查,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文献法。笔者参与到村庄的橡胶生产及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对村干部、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并采用滚雪球式的方法访谈了其他关键信息人。此外,查阅了县志、佤族社会调查资料以及县档案馆的相关文献资料。

①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脱域”机制,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实际上,自然也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脱域”过程,从富含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要素中脱离,人更加重视自然的物质和资源属性。

②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M县人口大量外迁。1960年比1954年人口下降12.99%。此后,人口陆续回迁。1970年,由于“政治边防”和重新划分阶级,人心不安,人口再次大量外迁<sup>[9]43</sup>。1950—1970年,双村发生了3次人口大规模外迁至缅甸的事件。外迁-返回-外迁-返回的波动,打乱了刀耕火种的轮作秩序,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召利用浮萍、落子等制作绿肥,肥力比农家肥翻倍的数倍。

1970年推进“两化”上山,化肥、农药使用率逐渐上升,土地持续产出得以保证。

### 3. 橡胶种植业(1982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M县利用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双村橡胶种植最早始于此。1982年,M县主要领导“包干”,在各村蹲点抓橡胶种植。包产到户时,双村分到户的面积只占7块轮歇地中的3块,还有一半以上是集体的“机动地”。县政府采取“所有权不变,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形式,以每亩100元的价格从双村征用了约667hm<sup>2</sup>宜胶地发展民营橡胶种植,使用期限50年,费用逐年支付。由于橡胶树从种植到割胶的8年期间胶苗、肥料、劳力支出以及胶农的日常生活费用甚巨,个体胶农无力承担。M县提出“山坝结合,入股开发”原则,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多方合作方式发展橡胶生产。1982—1995年是橡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种“公司胶”时期:①公司。成立股份合作制的橡胶公司。橡胶公司负责育苗、芽接、开梯地、挖穴等技术培训和肥料供给。②基地。基地主要为胶农提供8年的粮食,主要是县内无橡胶村寨。③农户。胶农投入劳动,以10个劳动日=20千克原粮=20元人民币=1股的折算方式。橡胶收割后统一由勐马橡胶公司收购,公司按照比例分成。胶农分为专业胶农和兼业胶农,兼业胶农粮食自备。专业胶农来自内地以及县里其他区域的贫困户。双村每户都有1~2人加入橡胶兼业队。1995年以前,橡胶树面积达到1333.3hm<sup>2</sup>。

第二阶段是种“个人胶”时期。1995年以后,随着橡胶价格持续上升,村民纷纷将自留山杂木树砍去种胶树。2000年左右,承包地也全部改种橡胶。至此,双村全部橡胶林面积达到2400hm<sup>2</sup>,成为名副其实的“橡胶村”。随着市场放开,围绕胶树的交易也逐渐增多,包括:①胶树买卖。橡胶树交易非常频繁,一棵成年胶树的交易价格达到400元;②胶树租赁/承包。部分胶农胶树多,无力管理,承包给外地人经营,收入按照五五或者四六分成;③临时性雇工。胶树打农药,除草等出现临时性的雇工。2008年以后,随着“橡胶产权改革”<sup>①</sup>的完成,胶树完全归胶农所有。双村2009年人均年纯收入为5688元,2011年更是达到8255元,是全县平均水平

的数倍。

## 三、橡胶种植业形成的外部条件

双村橡胶种植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主要可以从政策、市场、技术和文化四大变量进行分析。

### 1. 政府“绿色产业”发展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以粮为纲”是主导的农业政策,政府工作重心是提高农业产量。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后,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其发展优势。M县确立了“胶糖茶”的绿色产业发展方针,希望将热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脱贫致富。橡胶种植收益高,风险低,成为M县大力发展的支柱产业。1980年省、地区、县相继成立了城乡企业局,民营橡胶划归城乡企业局领导。双村所在的勐马镇成立了勐马橡胶公司。橡胶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大部分的橡胶专业队队长都由生产小组组长或党员积极分子组成。为改变农产品难以外输的现状,M县不断加大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1972—1990年,为适应发展经济作物的需要,M县在各乡镇修建专用公路269条,641.87km……其中勐马镇橡胶专用公路13条46.1km<sup>[9]138</sup>。1982年,双村橡胶专用公路修通,橡胶外输得以实现。2011年,新修了水泥路,交通状况进一步改善。

### 2. 橡胶产业逐步市场化

M县民营橡胶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官方背景的“橡胶公司”对橡胶的收购、价格制定具有垄断地位。由于橡胶收益不高,胶农扩大橡胶种植面积的积极性一直偏低。2002年开始搞“私人胶”,即胶农开始种植具有个人所有权的橡胶树。2008年橡胶林产权改革后,橡胶产业发展中政府逐渐退出,市场自发调节逐渐成为主导。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所使用过的最有力的工具<sup>[10]168</sup>最终促成了“橡胶村”的诞生。竞争市场使得橡胶公司压价现象消失<sup>②</sup>,橡胶的收购价格得到大幅提高,从改制前的每公斤10多元提高到20多元。大量外来商人进入双村,纷纷买地种植胶树或者直接从村民手中购买胶树。伴随市场化不断发展,围绕橡胶“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逐步完善。双村10多处私人收胶点,以高价吸

①胶农出一定的资金可以把原来的胶树买断,变成属于个人的财产。

②在橡胶产权改革之前,胶农必须要把橡胶卖给橡胶公司。橡胶公司存在压价、压低干含(干胶含量)的行为,胶农意见很大。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冲突激化,爆发了“7·19事件”。橡胶产权改革彻底明晰了胶农和橡胶公司的关系。

引胶源。村民们收完胶水直接卖给收购商,收购商卖到橡胶加工厂,再把干胶运到外地。

### 3. 橡胶技术推广体系建立

民族地区农业转型与新技术的推广是分不开的。历史上佤族的农业技术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农业生产工具多为铁木并用,自己制作。在技术扩散的角度上,山地民族的技术主要是通过技术先进群体向技术落后群体自发扩散的方式。汉族、傣族等技术优势群体,对佤族的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技术自发传播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方式。1949年后,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以技术推广手段提高山地农业的生产率。1979年M县成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农业技术的推广,这是一种“自上而下”体系。这种技术推广方式在橡胶种植中发挥了巨大的效力。M县按照云南省《橡胶栽培技术规程》,通过技术人员下乡、开橡胶培训班等多种方式,逐级推广橡胶种植。由于先进技术带来产量和收益的大幅提高,技术受众也乐于采用。现代技术推广方式大幅度提高了佤族生产技术,使农民掌握了相对复杂的农业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转型。

### 4. 胶农经济理性驱动

1949年以来,佤族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传统时期农民的行动逻辑以“生存伦理”<sup>[11]</sup><sup>16</sup>为基础,与现代追求资本积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相背离。生存导向型社会有一套经济和社会逻辑防止粮食短缺和盈余,自我调适以适应“食物/劳动力比率”<sup>[12]</sup>。消除盈余的方法往往是挥霍。例如,“鏢牛”是佤族的传统风俗,每年都有大量水牛被杀。传统仪式也限制了劳动生产率。历史上佤族寨中死人,全寨都要忌生产一天,丧家则忌数天。一个劳动力一年劳动时间不到173天<sup>[13]</sup><sup>240</sup>。新中国成立后,佤族传统文化中不利生产的部分被政府加以改造,传统文化经历“祛魅化”。“鏢牛”习俗逐渐被废除,耕牛被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加以保护。1980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村民经济理性日益膨胀。金钱成为村民炫耀和攀比的重要手段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橡胶大面积种植的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日益膨胀的经济理性。

## 四、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生态后果

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结果是土地的利用方式改

变,土地利用率高,单一经济功能的橡胶林取代多种功能的杂木林,隐性的生态问题逐步显性化。主要表现为对水、土壤、生物多样性、气候的负面效应。

### 1. 生物多样性锐减

双村单一化种植达到极致,村里除了20hm<sup>2</sup> 竜林、寨林外,可利用土地全部种上了橡胶树。历史上滇南是中国物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除了大象没有,其他什么动物都有”。1949年以后的毁林开荒造成了物种锐减,橡胶产业极大地加剧了这一进程。橡胶林如同“绿色沙漠”,各种动物、鸟类、药用和食用植物都销声匿迹了。一位老村民以不无惋惜的口吻说道“鬼神走了,鸟也走了”。

### 2. 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与现代技术引进相关。轮歇地农业时期基本不使用化肥,主要使用农家肥。1979年政府推行“两化上山”(化肥、化学农药)后,农业面源污染初步显现。种植橡胶树后,化学肥料的使用量急剧上升。村民表示“橡胶树不吃肥料,胶水不多”。树龄越长,肥料使用量越多。此外,橡胶林还大量使用化学除草剂和其他农药。经济作物大量使用化学肥料造成了M县主要河流的污染。

### 3. 水土流失

与杂木林相比,橡胶林的稀疏度较高。作为人工精心设计的森林体系,采用“宽行密株”的种植形式,每亩只能种30棵,株距2.5~3m,行距8~10m。2010年4月笔者调查时,胶林出现“白粉病”,叶子掉落,光秃秃的。阳光直射到地表,黄土裸露,寸草不生。地表植被覆盖不足引起的流水侵蚀导致了物理性的土壤恶化,水土流失加重。村民表示,以前雨后箐沟的水是清的,现在一下雨就浊。2012年8月,连续半个月的大雨造成双村橡胶林出现多处塌方,很多小橡胶树被径流冲倒。

### 4. 水资源枯竭

橡胶是耗水性植物,一棵胶树年产胶20kg,一亩胶林年产干胶600kg。胶水中的干含约30%~40%,剩余60%~70%为水分,一亩胶林年产胶水1500kg以上。当地水资源以胶水外输的形式被抽离。橡胶林涵养水源功能不足,加之蒸发量加大,很多小溪干涸,双村面临无水可喝的绝境。近几年连续干旱,每年双村都面临缺水难题,十多公里外接来的水只能保证全村半天供水。大面积橡胶林加剧了旱情的程度,减弱了村庄的干旱抗御能力,增加了干旱应对的社会脆弱性<sup>①</sup>。

<sup>①</sup>在灾害社会学中,社会脆弱性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与以往研究关注自然灾害本身及其后果不同,社会脆弱性研究更加关注群体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经济文化行为等特征在应对潜在的灾害时的脆弱性(参见[14])。个人经济理性膨胀,原生林的破坏和大面积的经济作物种植,必然减弱村民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小灾”可能造成“大害”。

## 五、自然过度资本化双重逻辑

自然的客体化逻辑和资本的增殖化逻辑是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资本逻辑塑造了村民的观念与行为。下面笔者从村民行为及观念的转变入手,分析自然过度资本化的双重逻辑在微观层面的作用机理,进而阐释生态失衡的内在根源。

### 1. 自然的客体化逻辑

#### (1)“人-自然”关系:从“生活世界”到“自然资源”

英国生态人类学家英戈尔德的“栖居”理论指出“人-自然”的关系并不是“自然决定文化”或“文化形塑自然”的简单二元关系,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建构关系,“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建构,与人们行为实践的发展,以及其他生命形态和环境本身的发展变化都是同步的”<sup>[15]28</sup>。双村自然资本化过程见证了“人-自然”关系的急剧转变。传统农业时期,自然是人的生活世界,人与自然处于互利共生的系统之中。森林具有采集、狩猎、水源、木材、防风、风景等多种功能。同时,佤族传统宗教是以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位一体的原始宗教,山、水、林无不有神。传统的佤族村寨都有大片竜林。竜林禁忌反映了佤族传统信仰和对自然的认知,村民表示“以前别说砍竜林里的树,就是掉的树枝也不敢带回家烧,要遭报应的”。同时,在与自然相处的生活实践中,山民发展出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和社会规范。1949年以后,权力、知识、资本合力将自然资源化、客体化、商品化。当下村民的认知中,森林仅仅是一种赚钱的工具,传统时期多样的意义以及多种功能彻底消失,自然“祛魅”成为现实。

#### (2)知识体系:从“地方知识”到“科学知识”

自然资本化依赖的是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科学知识体系逐渐替代传统地方知识成为支配农民行为的原则,这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sup>[16]190</sup>逻辑异曲同工。地方知识逐渐沦为附庸。地方知识被替代除了科学知识具有明显的话语权力以外,还与地方生态知识自身的低效率关系密切。随着农业商品化的推进,传统地方知识消失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的地方生态知识具有环保正效应,科学知识对地方知识的替代制造了严重的生态危机<sup>[17]</sup>。科学知识以提高效率为首要目标,加大了对资源的利用程度,与追求“生产—生态”动态平衡的地方知识相冲突。例如,典型意义上的轮歇地农业通过有序休耕,可以保证植被的

恢复和总体生态平衡。但是,因为产出较低而受到贬低。高科技农业可以显著提高产量,却带来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环境后果。传统时期村民的砍树一般不砍幼苗,且都会留下30~40 cm长的树根,保证树根更快地“发”。但是,经济作物种植对杂木树采取了“剃光头”式“片甲不留”的砍伐方法,用火烧或者炸药清除树根,造成了杂木树彻底无法再生。

### 2. 资本的增殖化逻辑

#### (1)需求欲望:从“自给自足”到“无限欲望”

人的需求欲望是资源利用程度的重要变量,高强度的欲望必然伴随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传统农业是一种自足的农业,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的,只有出现剩余才会出售。种植决定是基于家庭人口的粮食需求做出的。“欲望公式”为:欲望=人口×需求。传统农业中农民对市场、价格变化不敏感,不以需求最大化为目标。满足基本需求后,很少会扩大再生产。在现代农业学家看来,传统农业是低效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应用到传统农民身上时常常失灵。但是,市场化下的农民被“异化”为商人,在资本增殖化逻辑下“逐利而为”。“欲望公式”为:欲望=最大种植面积×最大单位产出,这种欲望直至达到资源利用的极限。以边际土地的使用为例,双村可以利用的荒地全部都种植了橡胶树,土地资源没有一点闲置。橡胶树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以保证其最大产出。但是,以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理性没有将一些公共物品,如土地、空气、河流、森林纳入成本核算中。结果必然是资源的过度消耗、地力的衰竭,数量型增长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减弱退化<sup>[18]</sup>。

#### (2)资源使用:由“自主支配”到“外部权力”

传统农业中农民具有自主支配权。对于双村村民来说,传统农业时期,粮食作物自己种植,对肉类的需求可以通过养殖家畜、打猎获取,只有极少数的生活必需品从市场购买。在这种封闭系统下,自然资源使用完全是由本地居民自主支配的。而市场化下的商品农业所处的市场经济体系要求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系统。农业系统被卷入市场体系中。产品是为了出售而生产,价格成为商品生产的调节器。生产本地化,消费外地化。双村的橡胶被卖到城市甚至国外。外部系统日益成为生产的决定要素,或者说农民的生产是由外部权力支配的<sup>①</sup>,要注意到市场中的全球体系与权力不平等。而市场加剧

<sup>①</sup>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到“生产—消费”的产业链中看不见的外部“权力”。他以拉丁美洲的蔗糖生产为例,详细阐述了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参见[19])。

了自然资本化的进程,卡尔·波兰尼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正由“嵌入”到“脱嵌”转变,市场日益脱离社会控制,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力量,不断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卷入市场<sup>[3]5-16</sup>,生态日趋恶化。

## 六、结 论

资本与生态具有根本的内在冲突。市场对自然赋值,把自然变成商品,追求最大产出但是没有考虑自然的稀缺性与再生性。不受约束的自然资本化造成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现实,这是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M 县政府的“中低产林改造”项目可以明显看出自然资本化的意图:根据《M 县中低产林改造工作五年规划》规定,将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逐步改造 14 667 hm<sup>2</sup> 木材年出方量较少的杂木林为具有较高产出的经济林木。在水危机的大背景下,开发仍不止步。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是需要考虑长远的生态后果。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承认自然资本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但是需要反思环境问题市场机制<sup>[20]</sup>,探索如何防止自然的过度资本化,合理把握资本化的“度”,实现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sup>[21]</sup>,还需要探索。另外,自然过度资本化中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还需要深入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环境行为演变中的经济因素<sup>[22]</sup>。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政府、企业、农民都能从中实现利益、获得满足,但个体理性却造成了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有助于深化对自然资本化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 1 ] MOORE J W.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the metabolic rift in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 J ].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2000( 13 ): 123-157.
- [ 2 ] ESCOBAR A. Constructing nature: elements for a poststructural political ecology [ M ]//PEET R, WATTS M.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 [ 3 ]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M ]. 冯钢,刘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 4 ]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 M ].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 5 ] 沈振宇,王秀芹. 自然资源资本化研究 [ J ]. 生态经济, 2001(3):28-31.
- [ 6 ] 陈阿江. 剧变:中国环境 60 年 [ J ].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4):34-42.
- [ 7 ] ESCOBAR A. After nature: 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 [ J ].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9, 40(1): 1-30.

- [ 8 ] FOSTER JB. Marx '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 J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5(2): 366-405.
- [ 9 ] 孟连县志编纂委员会.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志 [ M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 10 ] 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 M ]. 耿建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 11 ]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 M ]. 程立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 12 ] BECKER C. Garden money buys grain: food procurement patterns in a malian village [ J ]. Human Ecology, 2000, 28(2): 219-250.
- [ 13 ] 赵富荣. 中国佤族文化 [ M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 14 ] 周利敏. 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 J ].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0-28.
- [ 15 ] INGOLD T.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 M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 16 ] 杨善华.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 17 ] 耿言虎. 现代性与农村生态危机:“断裂”的视角 (1949—2012) [ J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17-24.
- [ 18 ] 侯向军,刘细发. 生态建设与发展方式的转变 [ J ]. 经济问题,2013(8):33-35.
- [ 19 ] 西敏司. 甜与权力 [ M ]. 王超,朱健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 20 ] 王书明,李慧,同春芬. 社会科学对水环境问题研究的视角及其进展 [ J ]. 水利经济,2009,27(6):7-9.
- [ 21 ] 傅红专,王川生.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念及对党的建设的意义 [ J ].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79-82.
- [ 22 ] 徐寅,耿言虎. 城郊村落水环境恶化的社会学阐释 [ J ].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2): 41-44.

